

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新考

郑锦怀¹ 岳峰²

(1.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 2.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金尼阁两次来华,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学中传方面,金尼阁主要编写了一本万年历的历法书《推历年瞻礼法》,并与张赓合作,选译了部分《伊索寓言》故事,结集为《况义》印行。在中学西传方面,他既第一个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又首次将中国儒家典籍“五经”译成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另外还编写了一本重要的汉语工具书《西儒耳目资》,并编译了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史著作《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

关键词:金尼阁;中西文化交流;伊索寓言;五经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1)02-0038-06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金尼阁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在翻译扩充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直译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但中国学界通常将其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之外,金尼阁还尝试将中国儒家典籍“五经”译成拉丁文 *Pentabiblion Sinense* (一般译为《中国五经》),撰写了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史著作 *Annales Regui Sinensis* (一般译为《中国编年史》),并在《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利用西方语音学理论来分析汉语音韵规律,等等。对于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取得的成就,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展开了一定深度的探讨与分析。尽管尚无研究专著问世,但许明龙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徐明德的《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等书均辟有专门章节对其加以阐述。期刊论文方面,则有计翔翔的《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与大通的《金尼阁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等文考察了金尼阁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所做的贡献。

不过,就目前所见,尽管论者颇多,但相关阐述尚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有的甚至还存在疏

漏或错误。这些无疑不利于我们全面把握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重要活动开展更为深入而系统的考察。

一、金尼阁生平简介

1.1 国籍考辨

关于金尼阁的国籍为何,中外学界一般持有两种看法,即法国说与比利时说。

杭州西郊桃源岭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的金尼阁墓碑上刻有:“金四表先生,讳尼阁,圣名尼名(“各”之误)劳□□□□佛兰第亚国人。”^{[1](P73)}以前,不少学者认为“佛兰第亚国”即为法国。但从读音上来看,“佛兰第亚国”不可能是 France 一词的音译,反倒是 Flanders (法文又作 Flandre,一般译为“佛兰德”)的音译,因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拉丁文又作 Trigautius 或 Trigaultius)于 1577 年 3 月 3 日出生在杜埃城(Douai),而杜埃城传统上属于佛兰德地区的一部分。

我们要探究金尼阁的国籍,就得考察杜埃

收稿日期:2010-09-23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项目编号:2009B20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锦怀(1981-),男,福建德化人,泉州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中西文献交流研究等;岳峰(1966-),男,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城归属的历史演变。事实上,从1384年起,杜埃城属于勃艮第公国(英文 Burgundy, 拉丁文 Burgundia, 法文 Bourgogne);1477年起,杜埃城归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统治;1556年起,杜埃城归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管辖。但到1667年,杜埃城被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军队占领。根据1668年达成的爱克斯-拉-夏贝尔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杜埃城被割让给法国。到1713年,杜埃城完全并入法国,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从其出生到逝世,金尼阁的家乡杜埃城都是西属尼德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称金尼阁为西属尼德兰人。但由于在金尼阁去世后约半个世纪,杜埃城便被法国军队占领,后来更完全并入法国,因此他长期以来也多被视为法国人。

此外,金尼阁生前曾自称比利时人。比如,金尼阁于1615年在德意志奥格斯堡(Augsburg)刊印由他本人整理的利玛窦遗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时便在封面上自称“Belga”(比利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历史上在佛兰德地区居住的多是比利时人部落,金尼阁本人大概便是其中一员。而且在1830年,包括佛兰德在内的原西属尼德兰南部各省还脱离尼德兰王国而独立,成立了比利时王国。因此,称金尼阁为比利时人也并非毫无根据,反而更加准确。

1.2 来华前活动简述

金尼阁曾在杜埃城耶稣会士主持的学校就读,于1594年获得文艺硕士学位,之后不久便加入了耶稣会^{[2](P115)}。关于金尼阁加入耶稣会的具体时间,中外学界说法不一。比如,费赖之认为金尼阁是在他获得硕士学位的几周后加入耶稣会,并于同年11月9日在法比教区的土尔城修院开始受业^{[2](P115)};威赛尔(C. Wessels)则称金尼阁于1594年11月24日加入耶稣会(Nicolas Trigault...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November 22, 1594)^{[3](P2)}。

见习之后,费赖之到里尔城学习修辞学与哲学,后在根特城教授修辞学两年。与此同时,他还学习、研究语言、地理、天文、数学、医学等,因为这些学科均有助于传教。^{[2](P115)}

1607年,经耶稣会总会会长许可,金尼阁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于同年10月9日到达印度果阿(Goa, India),并在那里传教约两年^{[2](P115)}。

1.3 首次来华

据费赖之所言,在1610年中,金尼阁应召来

到澳门。次年,金尼阁被派到南京,在王丰肃(高一志)与郭居静的指导下学习汉语。不久,应李之藻的请求,龙华民令金尼阁与郭居静二人一同前往杭州。^{[2](P11)}

关于金尼阁二人前往杭州的时间,费赖之并未明示。对此,有学者指出:“1610年,澶州知州李之藻进京入觐时,患病京师,幸亏利玛窦躬身调护,才转危为安。康复后,他接受利玛窦的劝告,受洗加入天主教,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翌年,李之藻因父亲病危,告假回故乡杭州,遂借机邀请郭居静和金尼阁两位神甫,以及中国籍修士钟鸣仁同赴杭州开教。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批准了这一邀请,一行四人遂于1611年4月离京,5月7日抵达杭州。”^{[4](P86)}

金尼阁等人在杭州开展传教活动,并成功地让李之藻的好友杨廷筠在1611年6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杨廷筠入教后不久,金尼阁、郭居静与钟鸣仁都患上重病。由于郭居静久病不愈,他们便商定将郭居静送往南京治疗,而金尼阁则去北京报告教务。金尼阁正是在这次北京之行中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后来又其整理成《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印出版。完成任务后,金尼阁南返,其足迹遍及江南六省。^{[4](P87)}

1.4 返回欧洲

据费赖之所言,金尼阁于1612年从南京赴澳门,1613年年初再乘船到达柯枝,一路劳顿,终于在1614年年底到达罗马^{[2](P116-117)}。另有学者说得更加具体,称金尼阁于1613年2月底在澳门乘船,于同年5月到达印度柯枝,然后弃船改走陆路,北上到达果阿,又穿越伊朗、阿拉伯沙漠和土耳其,抵达开罗附近的赫里澳波力斯,再横渡地中海,终于在1614年10月11日到达罗马^{[4](P88)}。

从澳门到罗马的漫漫旅途中,金尼阁孜孜不倦地整理利玛窦的遗稿。到达罗马之后,金尼阁继续其整理活动,终于在1615年1月14日完成整理活动。1615年9、10月间,这份书稿在德意志奥格斯堡正式出版。该书全称为*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Ex P. 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entarj. Libri V. AD. S.D.N. Pavlym. V. In quibus Sinensis regni mores, leges atq instituta & nouae illius Ecclesiae difficillima primordia accurate & summa fide describuntur. Auctore P. Nicolao Trigavtio, Belga, ex eadem Societate*,中译则为“耶稣会士利

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会务记录五卷 致教皇保罗五世 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 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阁^{[10](P2-3)}。

金尼阁先后于 1615 年和 1616-1517 年两次进行环欧旅行,极力向社会各界介绍中国文化,宣传耶稣会的在华传教活动,为在华传教士募集图书,以及招募新人前往中国传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4](P90-92)}。

1.5 再次来华

1618 年 2 月,金尼阁重返里斯本,与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 22 名传教士会合^{[2](P118)}。1618 年 4 月 16 日,金尼阁携带这 22 人及数千部募集的图书^{[4](P92)},乘坐“布诺·格苏号”(Buono Gesu)船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赴华之旅^{[2](P118)}。

东行途中,先后有 7 名传教士患病逝世。1618 年 10 月 4 日,船抵印度果阿。据费赖之所言,金尼阁等人于 1619 年 5 月 20 日乘船离开印度,于 1620 年 7 月 2 日到达澳门。^{[2](P119-120)} 但亦有学者认为:“1619 年 7 月,金尼阁及随同来华的邓玉函、汤若望、费尔德、伏若望、齐惟才、罗雅谷等传教士先后到达澳门。”^{[4](P93)}

1621 年初,金尼阁与曾德昭同赴南昌,居留数月,后到建昌、韶州等地传教。由于民众仇教,金尼阁于 1622 年不得不避居杭州。1623 年,金尼阁来到河南开封传教三、四个月。^{[2](P120)} 1624 年,应中国教徒韩霖、韩云两兄弟的邀请,金尼阁前往当时的山西首府绛州传教一年。^{[4](P93-94)} 1625 年 4 月,应王徽的邀请,金尼阁入陕西传教,主要在西安活动。

在绛州、西安传教期间,金尼阁设立印书厂,印行相当多的中文书籍与数种拉丁文书籍^{[2](P121)}。此外,他自己也编撰了不少著作,主要包括《西儒耳目资》、《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ni Sinensis*),另译有《况义》、《中国五经》(*Pentabillion Sinense*)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P94-95)}。

1627 年,金尼阁再度被召回杭州。此后他就在杭州专心传教与著述,直至 1629 年 12 月 12 日逝世。金尼阁的遗体安葬在杭州武林门外西郊桃源岭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4](P97)}

二、金尼阁与西学中传

金尼阁是明末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的重要人

物之一。他一生著述相当之多,据费赖之所列约有二十种。在西学中传方面,除了在 1625 年于西安编写、刻印《推历年瞻礼法》一卷外^{[2](P117)},金尼阁最主要的成就是选译部分《伊索寓言》,汇成《况义》一卷。

1625 年,金尼阁在西安刊行由他自己口授、张赓笔述的《况义》一书。《况义》即为《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文言选译本,存世极少,目前似乎仅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三种抄本;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抄本收入了 38 篇《伊索寓言》故事的中文译文,即正文的《况义》(22 篇)与附录的《熊说》(16 篇)^{[5](P68-70)}。

金尼阁口授、张赓笔述《况义》一书的情况就跟清末福建著名翻译家林纾在通外文者口述下产出译文之举类似。我们谈及林纾产出的这些翻译作品时,一般只称“林译小说”或其他,我们绝不会因为林纾不通外文、单凭他一人根本无法进行翻译而认为这些译文不是林纾的翻译成果。因此,尽管金尼阁才是《况义》实际上的译者,但笔述者张赓的功劳也不可抹杀。

关于张赓,戈宝权在其《谈牛津大学所藏〈况义〉手抄本及其笔译者张赓》中所做考据甚详。据此知道,张赓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因泉州又称“温陵”,他常常自署“温陵张赓”,另外还有一个别号“夏詹”;他是天主教信徒,生有一子,亦为天主教信徒,教名“弥格尔”(Michael)。张赓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中举,曾担任浙江平湖县教谕,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离任^{[6](P434-435)}。张赓写有《阅杨淇园先生事迹有感》一文,文中称:“假缘辛酉之春,读书渐湖上,乃得闻天主正教,一时目传言者,耳传教言者,亦知吾死,朝闻夕可”^{[6](P435)}。此处“辛酉”即明天启元年(1621 年),而“浙湖”即为杭州西湖,由此可见张赓在从平湖县教谕一职离任之后来到杭州当官或闲养。而在这一年,金尼阁正避居杭州。因此,张赓完全有可能因结识了金尼阁而开始了解天主教教义,并进而成为一名信徒。到了天启三年(1623 年),张赓又出任中州(河南开封一带)教谕,而金尼阁也正好于该年到开封传教,次年又去山西,再过一年又赴陕西。由于《况义》一书在金尼阁入陕的天启五年(1625 年)就已经刊行,因此他极可能是在开封又跟张赓碰面,两人合作选译了这本伊索寓言集。

此外,《况义》卷末还有一篇跋文,作者谢懋明也是泉州人,为万历六年(1573 年)中举、曾担任

过县令一职的谢大有之子^{[6](P435)}。谢懋明身为痒生,学识渊博,颇有才名。明天启五年(1625年),艾儒略应大学士叶向高的邀请入闽,闽地名流、学子应邀在福州同艾儒略谈学论道,谢懋明便是其中一人。他还写了一首赠诗给艾儒略,诗曰:“方慰趋承近,俄惊别恨长。三山需后会,教在不言中。”^{[7](P81)}

三、金尼阁与中学西传

在中学西传方面,金尼阁的主要成包括: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将中国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 *Pentabilion Sinense*(一般译为《中国五经》);编写《西儒耳目资》;编译 *Annales Regui Sinensis*(一般译为《中国编年史》)。

3.1 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

1625年4月,应王徵的邀请,金尼阁赴陕西传教,长居西安。此前在1623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附近的整屋县(今周至县)出土,而金尼阁便幸运的成为得见该碑的第一位欧洲人。

所谓“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是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us,约386-451)所创,故又称“聂思脱里派”。景教受正统天主教的排斥,后来传到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到中国传教。^{[8](P112)}景教专走上层路线,在初唐、盛唐时期颇有影响。在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景教传教士伊斯(Yazdhozid)便在大秦寺院中立碑,因该碑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后世称之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碑文由景教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其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阿罗本来华传教的经过,记载了景教经典《尊经》被译成中文之事,还大量引用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该碑无疑提供了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中西交通的重要证据。正因为如此,金尼阁于1625年将其译成拉丁文,由在山西传教的耶稣会士罗雅谷(Jaoques Rho, 1593-1638)于同年寄往欧洲^{[8](P112-113)},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的第一个西文译文。

其实,关于罗雅谷寄往欧洲的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拉丁文译文,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它是金尼阁所译,但也有人认为它出自罗雅

谷之手。不过,据计翔翔所说,该译文末尾附有罗雅谷的书筒,而后者称该译文是金尼阁在王徵、张纁芳等中国文士的帮助下在西安翻译的。但计翔翔同时也指出,该译文中含有葡萄牙人的惯用缩写符号,而那应当是罗雅谷整理、誊抄时所为;同时,在交趾支那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路易斯(Gaspar Luiz, 1586-1648?)也曾“根据金尼阁神甫自汉文译作拉丁文的忠实译文”寄出一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的译文。^{[9](P181)}由上可见,在1625年,金尼阁在王徵、张纁芳等中国文人的帮助下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将其寄给在山西传教的罗雅谷,经后者整理、誊抄,于同年寄往欧洲。

3.2 翻译《中国五经》(*Pentabilion Sinense*)

其实,金尼阁早在1515年1月14日就为其整理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撰写了一篇序言《金尼阁致读者》,文中提到他要完成“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关于辩论道德问题,从而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多么适宜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1](P42)}由此可知,金尼阁是要用拉丁文完成一部采用“辩论”方式即对话体的、与中国的道德伦理问题相关的著作。在中国的儒家典籍中,与他提到的这些特征相符的似乎只有《论语》。据此似乎可以推断,金尼阁曾计划将《论语》译成拉丁文。这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费赖之曾经指出:“副区长又曾以校刊《四书》译注之任委之。”^{[2](P124)}设若金尼阁对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的翻译工作没有半点研究,他如何能够承担“四书”译本的校刊工作?不过,金尼阁显然未曾完成他的这一计划,但他后来却将其他中国儒家典籍译成了拉丁文。

据费赖之所言,金尼阁译有:“《中国五经》一卷,一六二六年。中国《五经》之译注本也。利玛窦前有《四书》译注本,尼阁又取《五经》译为拉丁文,附以注解。吾人不知此译本之归宿,且不知其是否已寄达欧洲。”^{[2](P124)}

目前,中国学界在论述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之举时,多引用法国戴哈尼(Chr é tien Dehaisnes, 1825-1897)所著《金尼阁传》(*Vie du Pere Nicolas Trigault*, 1861年在法国杜埃[Douai]刊印;或译《金尼阁神甫传》)第206页作为证据^{[12](P55-56)}。

但据笔者查阅, *Vie du Pere Nicolas Trigault* 第206页似乎并无相关文字提到金尼阁所译这

本 *Pentablibion Sinense*。不过, Ant 6 nio Vieira 等人所编 *Chave dos profetas* 第 3 卷在列举金尼阁著译书目时有如下记载:“*Pentablibion Sinense quod primae atque adeo Sacrae Auctoritatis apud illos est*(par á frase em Latim); Si jou eul mou tseu[um vocabul á rio chin ê s](Han tcheou 1626)”^{[13](P223)}。

据此可知,金尼阁所译“五经”拉丁文译本全名为 *Pentablibion Sinense quod primae atque adeo Sacrae Auctoritatis apud illos est*, 中译即为《中国五经——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该译本于 1626 年在杭州(Han tcheou)刊印,是“五经”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在中国儒家典籍外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该书失传已久,无法了解其具体情况。

3.3 编写《西儒耳目资》

为了便于传教,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第一要务就是学会中文,熟读中文典籍。但对于一般西方人来说,中国文字艰深难学,必须有适用的工具书提供帮助才能较快地学会中文。正因为如此,较早来华传教的罗明坚与利玛窦等都编写过一些词典,方便后来者学习中文。

在王徵的帮助下,金尼阁用西法整理汉语音韵,三易其稿,终于在 1626 年春编成《西儒耳目资》三卷,由张问达出资在杭州刊印^{[4](P95)}。全书共分为 3 篇,即《译引首谱》(总论,从理论上阐述文字学及编译原则)、《列音韵谱》(按照音韵排列汉字,可从拼音查汉字)、《列边正谱》(按照偏旁排列汉字,并用拉丁文注音,可从汉字查拼音)。金尼阁的拼音方案继承了利玛窦《西字奇迹》的拼音传统,五声的调号全部沿用,字母的使用也大体相同,但其方案更为完整、规则。它简便实用,不仅能够帮助外国传教士迅速学会中文,也有助于西文汉译的规范化。事实上,在《西儒耳目资》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多以它做为西名汉译的重要依据。^{[12](P56)}

3.4 编译《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

金尼阁很早就想撰写一部中国编年史。他在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所写的序言《金尼阁致读者》中称:“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为你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11](P42)} 不过,金尼阁的这个计划一直

到其人生的最后几年才开始进行。

费赖之所录金尼阁著译书目第十四种如下:“《中国年鉴》四卷。”^{[2](P124)} 这里的“《中国年鉴》”即为金尼阁所计划编写的《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由于中国史册卷帙浩繁,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金尼阁其实是采用编译之法来完成这部著作:“《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是根据中国史籍编译的一部中国通史,计划从远古写起,一直写到明朝,共分为四册。”^{[4](P94)} 这种可能性极大。

据费赖之所言,金尼阁在 1524 年就写完了远古到公元前 560 年的中国历史,1626 年写到纪元(公元元年),1627 年又写到公元 200 年。《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分为四卷,其中第一卷为二开本,当时已经正式刊印,并交人于 1628 年带到欧洲;其余三卷却毫无消息,不知是否已经完成并刊刻。^{[2](P124)} 但不管怎么说,金尼阁的这部《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已经意义重大。有学者就称之为“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并认为该书为金尼阁奠定了其汉学家地位^{[12](P55)}。

四、结语

金尼阁两次来华,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学东传方面,金尼阁主要编写了一本万年历式的历法书《推历年瞻礼法》,并与张赓合作,选译了部分《伊索寓言》故事,结集为《况义》印行。在中学西传方面,他既第一个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又首次将中国儒家典籍“五经”译成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libion Sinense*),另外还编写了一本重要的汉语工具书《西儒耳目资》,并编译了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史著作《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他的著译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计翔翔.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J].世界历史, 1995, (1).
- [2]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
- [3] Wessels, C.. *Early Jesuit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1603-*

- 1721[M]. Ottawa:Laurier Books Ltd., 1997.
- [4] 徐明德, 计翔翔.杰出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A].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C].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 [5] 内田庆市.谈《遐迩贯珍》中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汉译小史[A].松浦章, 内田庆市, 沈国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 [6]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
- [7] 林金水.《闽中诸公赠诗》初探[A].陈村富主编.宗教文化 3[C].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 [8] 马祖毅, 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9]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0] 何兆武, 何高济.中译者序言[A].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1] 金尼阁.金尼阁致读者[A].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2] 计翔翔.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J].杭州大学学报, 1994, (3).
- [13] Vieira, António etl. ed. Chave dos profetas vol.3[Z].Lisboa: Biblioteca Nationalm, 2001.

责任编辑: 冯济平

A New Survey of Nicolas Trigault's Contributions to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ZHENG Jin-Huai¹ YUE Feng²

(1.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Nicolas Trigaul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articles dealing with his life activiti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oints left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irst endeavors to make clear Trigault's major life activities, and then conducts a survey of his achievements in introducing Western culture to the Chinese people, focusing on his translation of Aesop's Fables. It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Trigault translated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Xi'an as well as The Five Classics into Latin for the first time, compiled the important Chinese dictionary Xiru Ermu Zi, and worked out Annales Regui Sinensis which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al book o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West.

Key words: Nicolas Trigault;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esop's Fables; The Five Classics